从历史学习：中国-牙买加关系”

于 2017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天发布于中华会馆 – 郑锦辉博士, Dr. Victor Chang,

(Translated by Dalton Yap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friends of the CBA.)

常言道忘记历史者定会重蹈覆辙。有鉴于此, 我想要回顾在 1918 年, 1938 年和 1965 年发生的, 被形容为排华的暴动事件，并尝试提出它们之间所共有的某些特征，及它们所揭示中国人这一少数民族在牙买加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的关系, 以及它们如何有可能被视为是对未来的警示。

我更着重的是两个含有比较多记载详细的事件, 第一个发生在 1918 年 7 月和在 1965 年 8 月 28-29 日周末期间发生的第三个事件。因为这两个事件似乎都是因个人之间的私人纠纷最终成为引爆暴力和破坏的导火索。 而 1938 年暴动的原因却没有那么容易解释.

这三个事件的共同点都是发生在牙买加奴隶制和剥削的历史背景下。 我们知道在奴隶制被废除后, 殖民地的统治精英们面临着非常危急的劳工短缺 —— 于是他们想到了从印度和中国进口劳力。

而根据英国人一开始的设想，将中国人带到加勒比除了作为劳工这一因素之外, 还有另一个原因：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举措, 因为中国人能够成为“我们和黑人之间的屏障, 他们之间不会结盟, 因此总能形成一个强大有力的对立……”并且“出于习惯和情感, 他们会与黑人保持距离, 而从利益的角度上，他们会更愿意和欧洲的雇主们所保持紧密的关系。 “

在 1854 年和之后到来的中国移民的条件是非常有利的：他们是有合同的，是有工资的, 是自愿来的, 合同最初的年限为 3 年, 而他们可以在合同结束后选择回国。他们可以免费住用花园洋房, 得到按时支付的工资, 并可以汇出一部分的工资给留在国内的家人。尽管大部分的承诺最终是空头支票, 从未兑现, 这样特出的条件是黑人奴隶们从没享受过的，所以这已经是酝酿怨恨和敌意最初的原因。

其次, 尽管许多人选择在合同结束后回到中国, 仍然有不少人留了下来并继续扩张他们在甘蔗种植园所允许开的小商店, 从由小店铺而扩张并遍布全岛, 几乎可以在牙买加每个城镇和村庄都能看到。许多更是赶超了当地的竞争对手。这些竞争对手的小店铺非常脆弱和不持久通常是因为“缺乏资金, 不予签帐及一般在做生意方面缺乏经验”。此外, 1891 成立的中华会馆向所有的中国店主提供了 “互助” 。有了这个支持系统, 他们可以在中国同胞那里获得货源和签帐, 从而 “使让当地人无从竞争” (Johnson, 25) 。我们得知, 到 1930 年中国人拥有 1200 个杂货店, 其中 400 个在金斯顿, 在其他地区有 800 个。

这是“从种植环境中迅速上升到以商业活动为基础的明确少数民族的中间商地位”。他们被认为是“从农业工人到小规模和大规模的贸易商的进化, 并在 1880 年进入中下层阶级, 最终有部分成为中产阶级上层”。 (Look Lai)

而这本身就是怨恨和敌意的另一个来源, 因为在当时严酷的经济条件和普遍贫困的状况下, 中国人只带了“背上的油布包”来到这, 并在短时间内聚积了财富、地位和房地产, 所以黑人觉得这些人的财产一定是从那些远比他们先来这里的人那里偷来的!

对中国人数量之多也引起了不满, 从 1854 年的 472 人, 到 1884 年的 696 人。到 1911 年, 岛上已有 2439 个中国人, 尽管他们仍只占了人口的 0.3%。但在《拾穗者 (Gleaner)》收到的信件中, 我们能看到排华的比喻反复出现, 例如“黄瘟疫”, “黄祸”, 以及 “蝗虫入侵” 等。其中一封给编辑的信写到： “天啊！ 让我们醒来，做点事，因为这些人在来，一直来，不停的来。我们可以做什么才能阻止这种中国人的入侵？？我们是否会让这些人压倒我们？” 对此, 法律通过并要求每个中国移民支付 30 英镑的押金和通过书面测试, 来证明他们可以用三种不同语言写 50 个字！

然而, 这一数字仍在继续增长, 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增加至 4000, 到 1930 年增加到 6000。1931 年, 牙买加要求香港停止给来牙买加的中国人签发护照。1940 年, 除了外交官, 游客, 和有许可证的学生外, 其他所有中国人都被禁止进入牙买加。而 1943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 该数字增加到 12394, 其中 5155 人在被归为 “有颜色的中国人”, 这显示了存在的有多少混血人口。有人说, 中国人到牙买加来始于一条小溪, “后成为更宽广的河流, 最终发展成一场洪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1918 年, 情况尤为糟糕。这一年有许多工人动乱以及食物价格上涨。霍华德•约翰逊 (Howard Johnson) 指出：“(牙买加) 面临…战时的通货膨胀和食物短缺, (而且) 平民认为中国对进口主食的价格上涨负责任。 ”

在 1917 年 10 月 4 日,圣安区委员会甚至在记录说, 中国人“是众多破产, 流浪和贫困的原因”, 并且“以目前的战争情况要求去做一些事情来保护那些在奔赴战场的人的父亲、母亲、和家人, 而留下的中国人却变得富有, 享受着安全和特权。这些外国人甚至没有被征收额外的税来补偿那些为他们打仗的人。”

1924 年, 牙买加的中华会馆向驻伦敦的中国大使报告说, 他们生活在恐惧和暴力的氛围中, 已经有 6 名中国移民被杀害。

20 世纪 30 年代由大萧条 (The Great Depression) 引发的也是一样的动荡和资源短缺。开始于 1929 年的一场严重的全球经济萧条导致美国失业率高达 33%, 而经济不发达的西印度群岛失业率更高。这导致许多国家制定了保护政策, 因此许多在国外工作居住的牙买加人回到了岛上, 导致失业者队伍膨胀。所以 1938 年是整个英属西印度群岛劳工动乱的一年。而中国人不可避免的再次成为替罪羔羊, 被指控提高商品价格, 哄抬公众物价来增加利润。此外, 他们被指控利用恶劣不堪的经济环境, 形成 “一个强有力的联盟进入一些企业的领域, 包括购买...轮船和码头物业。” 大萧条

所带来的政治动乱无处不在，甚至导致了 1933 年的德国纳粹政权上台。而这些因素有利于群众针对在金斯顿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的暴动。

1965 年又是充满动荡和暴乱的一年，导致牙买加在 1967 年在牙买加宣布紧急状态。由于对中国人在发展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他们支持哪一个政党并不明确。加维 (Garvey) 认为他们 “在本质上就是荣誉白人和保守主义，并且是反民族主义”，他们被指责为 “完全缺乏公德心和傲慢的个人主义 “。他的妻子，艾米□雅克□加维 (Amy Jacques Garvey) 声称当地的中国华人社区除了资助岛上國民党的领事馆外还给予了在中国的伤兵 10 万英镑。她表示最繁忙的中国商店每年平均盈利 1000 英镑，并问道：“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些人把在岛上赚的钱交给了中国？”而且“难道他们现在只是在加勒比的中国‘群体’，还是他们以后会成为中国的‘殖民’？”

以上之外，中国人被普遍认为是不可信的。他们被人们说成是狡猾的，剥削性的，总是把利润放在第一位，给顾客缺斤短两。干波 (W.H.Gamble) 称 “口是心非，诡计多端…臭名昭著是众所周知的”，中国人被认为 “在食物和饮料里掺假。”

除此之外，人际关系的问题一直存在。首先由指控中国人不合群并且保持 “种族和文化的分离”，(Brereton) 而至控诉中国男人在偷取他们的女人！他们的怨恨是因为很多中国男人- 基于人性 -都在当地找了情妇。我们读到在 1898 年，“由于中国女性特别稀缺，而中国男人通常会选择有色的女性做妾，他们一般情况下总有办法得到那里最漂亮的女孩”。“直到 1947 年中国人士才被允許每年可以办理妻子和小孩的总移民人数配额不超过二十人。”

关于这三次动乱，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似乎是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事件是事先有计划性和有组织性的。他们似乎是自发性的并且都是在当地的：在 1918 年 4 个教区的几个城镇，在 1938 年和 1965 年金斯顿的北街 (North Street)，百里街 (Barry Street)，西街 (West Street)，东皇后街 (East Queen Street) 和西班牙镇路 (Spanish Town Road)，由于警方和执法部门的行动，这些暴动均持续不到一周。事实上，在所有的暴乱中，没有中国人遇害。尽管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并且他们不得不逃跑，或者在有同情心的黑人家庭中寻求避难。

1918 年 7 月的第一次暴动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件事情是由警察麦克唐纳代理下士 (Acting Corporal McDonald)，这个 “漂亮男人” 的风流韵事引起的。他溜进了中国店主房秀(Fong Sue) 在尤尔敦 (Ewarton) 的店去偷会房秀的情人卡罗琳・•林多 (Caroline Lindo)。房秀去金斯顿出差，却意外提前返回并看到这对男女在床上，根据李・洛伊 (Lee Loy) 的原话，“做了所有其他男人会做的事情并…将 “漂亮男人’ 打得落花流水。他伤势一定很严重，因为麦克唐纳逃跑并消失了两天。”

在他失踪期间, 坊间传出他被房秀和其他三名华人袭击, 被阉割和杀害。这些谣言引起了愤怒并导致了暴乱。在 7 月 9 日的晚上, 300 多人聚集在尤尔敦的四间商店, 砸毁并抢劫了商店以报复华人对漂亮男人传说中所施的暴行。在人群中听到有人大喊着说“今天不让任何一个该死的中国人离开。” (引用来自李来 Lee Loy)

在这三日三夜里, 中国的商店遭到破坏, 里面的货物被盗或损坏, 涉事人员超过 1000 人。在 452 名被捕人员中 300 人由于参与而破坏而被判处劳改一年。1919 年《拾穗者 (Gleaner)》的一份报告引用了在圣凯瑟琳一次审判中证人的话： “所有的中国人都被迫逃跑和躲藏起来...证人说这些 (暴动者) 全都行动一致。他们声势浩大并下定决心要结束这些中国人的性命。 “

督察督察怀特 (Wright) 在正式的警方报告中证实暴乱是因为“谣言说 (警员) 被中国人杀害。并以此为借口, 在 8 日周一晚大批人群聚集在尤尔敦村, 并开始打砸中国商店, 以及掠夺商品。他们之所以能得手是因为只有少数的警察在场, 而警察能做的只是保护中国人不被杀害。” 《拾穗者 (Gleaner)》在 7 月 10 日的报导中说“人群们全执意于攻击中国人。” 听到有人在喊，“给我们被你杀害警员的尸体；那是我们想要求的, 别无他求。”

督察怀特 (Wright) 详细介绍说尤尔敦 (Ewarton) 的暴乱迅速蔓延到林斯特德 (Linstead) ：“中国的商店被打砸的情况和尤尔敦 (Ewarton) 那边类似。约 500 名暴徒用砖头、岩石、石头等砸碎和抢劫最后的一间最大的中国商店。

《拾穗者 (Gleaner)》7 月 9 日报道：“四家商店被打砸和抢劫。每家店都没有东西留下而业主也都逃离了当地...整条街全被抢劫店中的玉米面、面粉和盐所覆盖。”

暴乱迅速蔓延到保格沃克 (Bog Walk), 林斯特德 (Linstead), 红杉 (Redwood), 梨树林 (Pear Tree Grove), 罗瑟山 (Mount Rosser) 和雪松谷 (Cedar Valley), 然后到达特罗哈 (Troja), 西班牙镇 (Spanish Town) 和老港(Old Harbour), 围绕着四个区：圣安 (St. Ann), 圣凯瑟琳 (St. Catherine), 圣玛丽 (St Mary) 和克拉伦登 (Clarendon)。武装警察和西印度团的一支部队 “由 150 个官兵组成...然后被派遣...来预防并阻止进一步暴发。”

到 11 号, 暴动得到了控制并恢复了平静。逮捕了 452 人, 其中 300 人被定罪。大约有共 22 家商店被彻底摧毁和抢劫。。《拾穗者 (Gleaner)》 7 月 12 日估计，仅圣凯瑟琳就损失达几千镑。督察 Wright 报告说预估损失价值达到 1176 英镑 1 先令 3 便士！7 月 9 日《拾穗者 (Gleaner)》报告说政府正在提供 1 万 5 千英镑的补偿金。

必须指出这场骚乱中有两方面是离奇的。其中之一是传闻警察被杀害后并被腌制成咸猪肉售卖, 而一个旁观者则说 “他们吃狗, 所以他们一定也吃人！” 从这可以看出民众有多看低中国人。

其次, 当麦克唐纳下士两日后回来, 并恢复在派出所工作时,他安全返回的消息传播在这些受影响的地区以期平息暴民...这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且暴乱仍在继续...” 事实是，当《拾穗者 (Gleaner)》报道说 “当下士嘴唇肿胀, 头部有疤痕出现在众人视线前时, 他们宣称这是幌子, 他不是那个 ‘失踪的人’ ”。这明显证明暴民是多么荒谬。

1938 年的第二个暴乱

没有多少证据去表明是什么触发了 1938 年的暴乱, 而我也没做深一层的研究。我们只知道, 这一年同样是劳工动荡的一年, 随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发展以及像巴适塔曼塔 (Bustamante) 和 诺曼·曼利 (Norman Manley) 这些民族主义的新声音在挑战当权政府以及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黑人的声音都被听到。我在前面已经概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动荡和紧张的局势是如何容易地被引发暴乱的。

中国人被指控由通过支付低廉工资來剥削店员工, 违反法违在周日营业, 超过营业开放时间, 并推广使用鸦片等 “有害毒品” [“当地人正在屈服于这种邪恶和致命的习惯”] 及违反酒精及賭博的法律将字花等违法的赌博游戏引进賭房： “那些穷的, 饥饿的及低层人士是这些罪窝的常客-无论男人女人都带着他们的几个便士...被这些中国佬倾吞。”

1965 年第三次暴乱

1965 年 8 月 28 日周六, 乔伊斯·科普兰 (Joyce Copeland) 向警方报告说, 她和老板因为收音机的分期付款的未能支付产生了争执， 而且她还被刘家的三兄弟的殴打。和 1918 年一样，传闻引发的一连串暴力事件，导致众多中国商店在周末遭到 300 多人袭击和抢夺, 还被火烧铺。据说两名警察在骚乱中被枪杀, 六名平民受伤。

但这个叙述并没有考虑到此事件中所隐藏的故事, 而细节揭示了一个与 1918 年发生在尤尔敦暴乱的相似点。事实是, 乔伊斯·科普兰 (Joyce Copeland) 和他雇主刘先生是情人关系, 而他在妻子来到牙买加后将(Joyce)乔伊斯赶离了在葡萄园镇 (Vineyard Town) 的房子。之后她回到那所房子和他的妻子发生了口角, 而听到这个消息后, 刘曾在身体上对她施粗, 并踢了她好几下。所以, 在这个冲突中仍有性的方面。但大众并不知道这一点, 一场私人冲突成了这一无法无天的行为和暴乱的动力。有值得注意是, 在每个例子中重点都是哄抢, 所以人群不是出于任何高尚的动机, 只是混水摸鱼, 趁火打劫, 试图来帮补一下其不堪的经济状况。

所有的这些与新来的中国人在未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方面是告诉我们些什么呢？最近对中資公司表达敌意和他们在咆哮河流域(Roaring River watershed) 被政府批予的土地, 以及开发山羊岛(Goat Island) 的争议, 及在科克皮特 (Cockpit) 郡开采矿业, 邦庭 (Bunting) 先生指责的 “经济殖民化主义” 所有这些东西都像过去的火药桶一样。而同样再一次歪曲的谣言, 荒謬的指责, 挑衅和谎言作为催化剂, 危言耸听, 可能再一次催发灾难性的爆发。而我担心如果再出现类似的暴乱, 大众平民将无法将老一代的華侨華人和新移民分开, 而我们将再一次在暴力下被一起卷走。

Dr. Victor L. Chang **郑锦辉博士**

Translated by Dalton Yap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friends of the CBA.